

《史匯》  
第二十三期，頁73-110  
2021年4月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 國民政府時期的電影檢查與電影教育：以張冲主持電影為中心的考察（1934-1936）\*

林威杰\*\*

### 摘要

三民主義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根源，也是政權合法的依據。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以黨領政，以黨治國的政治組織。在建設三民主義國家進程中，國民政府透過各種手段與方式，希望將國民黨意識形態貫徹到每一位國民心中，而電影就成為最佳的工具之一。畢竟擁有龐大文盲的中國，透過電影能夠以圖像影音等方式，清楚的向民眾表達理念價值。因此，在國民黨尚未取得全國執政權之前，就深知電影的重要性。那麼，探究國民政府時期的電影事業，首先必須從電影檢查與電影教育兩個方向去著手。其中張冲在國民政府電影事業中扮演承先啓後的角色，他「中統」特務出身的背景，以及對俄語的熟練度，受到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的重視，並極力扶植他進入電影宣傳體系。兩陳兄弟希望利用張冲的專長，來瞭解各國電影發展的現狀，以及反共宣傳的運作，打擊那些不利於國民黨統治的影片，爭取意識形態的陣地。

關鍵詞：三民主義國家、電影檢查、電影教育、張冲、《農人之春》

---

\* 本文得到匿名審查人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盛差惲博士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以表感謝。又，本文係中山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中統局與國民黨的派系政治」（19wkpy45）階段性成果之一。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 一、前言

電影是近代科學巨大的成就，同時也是一門藝術，不僅涵蓋著生活中人們的食衣住行育樂，其影響所及可謂深遠。正因如此，世界各國十分重視電影事業的發展，試圖利用電影淺移默化民眾在意識形態上的認知，來加強統治上的方便。既然，電影檢查與電影教育是當時兩個核心價值，那麼國民政府電影事業之淵源為何？具體如何規劃？此外，張冲（1904-1941）曾在 1934 年至 1936 年主持國民政府電影事業，他是如何利用這兩個核心來強化三民主義的建設與塑造？又如何兼顧娛樂與社會風俗？值得深入探討。

關於中國電影的研究有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sup>1</sup>，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部中國電影歷史的著作。內容將中國電影發展的各個階段作了詳細的描述。由於成書時間較早，因此書中有較為濃烈的意識型態價值判斷，但不乏為一重要著作。相較於中國大陸電影史的研究，杜雲之《中國電影史》<sup>2</sup>則是臺灣早年電影通史的著作。此書分為三冊，時間斷線從晚清電影傳入中國起，截至 1960 年代為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利用一整冊的篇幅談論臺灣電影發展史，而不再是中國電影史支流的視角去看臺灣電影發展。書中闡述臺灣電影發展與國民政府時期是有承先啟後的概念。李少白主編《中國電影史》<sup>3</sup>，主要作為中國大陸大學使用的教材，內容將中國電影發展史作一完整的論述。此外，電影在臺灣與香港的發展，鑒於其特殊歷史背景，也將兩地電影發展納入整個中國電影發展史的支派。楊燕與徐成兵的《民國電影時期官營電影發展史》<sup>4</sup>，將國民政府時期的電影政策作一番闡述。內容講述國民政府發展官營電影的緣由、動機，初期電影政策的成形，到後來抗戰階段的愛國電影，以及戰後至遷臺前的電影發展。王朝光的《影藝的政治—民國電影檢查制度研究》<sup>5</sup>，則是探討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時期的電影檢

---

<sup>1</sup> 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卷 1、2（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

<sup>2</sup> 杜雲之，《中國電影史》，冊 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sup>3</sup> 李少白主編，《中國電影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sup>4</sup> 楊燕、徐成兵，《民國時期官營電影發展史》（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

<sup>5</sup> 王朝光，《影藝的政治—民國電影檢查制度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查制度。講述電影在不同時代中，當局者對於「違禁」影片標準的差異。文章對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電影控制與導向，以及市場需求，都有著深入的剖析。

過往的研究較少以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為主軸，去探究國民政府時期電影政策的淵源，也較少從張冲主持電影事業的視角去探究。本文利用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檔案，配合其他相關文獻來討論張冲主持下的電影事業，而這段期間是國民政府確立與完善電影檢查與電影教育的關鍵階段。

## 二、國民政府電影政策的淵源

張冲，浙江樂清人，他早年的東北求學經驗，練就一身的俄語專長，這成為日後發跡的重要關鍵。陳果夫（1892-1951）、陳立夫（1900-2001）兩兄弟是張冲政治上的貴人，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張冲能否一帆風順，可能就很難說了。因此，張冲的政治軌跡基本都與兩陳兄弟有很大的關聯，他先是在陳立夫的推薦下，進入到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以下簡稱調查科），任總幹事一職。在這裡張冲可謂將其所長發揮的淋漓盡致。這時候的張冲反共色彩濃烈，調查科所經辦幾項重大案件，基本上都是由他所設計規劃，如顧順章案、牛蘭事件以及影響周恩來（1898-1976）深遠的伍豪脫黨事件。但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有「調查科智多星」的張冲，難免搶去其上司徐恩曾（1896-1985）的風采。因此，張冲在陳果夫的引薦之下，走進了中國電影事業，而這又掀起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頁。在負責電影期間，張冲竭盡所能的把中國電影推廣到世界，讓中國電影能走出國門。《漁光曲》與《農人之春》的獲獎，更讓當時低迷的中國社會，多少帶來了一點民族自信，而這當中張冲佔了相當大的功勞。在張冲主持電影期間，不僅完善了電影檢查與電影教育，同時也鞏固了電影在意識形態的宣傳陣地。為此探究張冲在此階段的角色，有助於瞭解國民政府在電影意識形態上的決策過程。

電影是科學和藝術共同培育出來的一朵燦爛的花朵，「電影事業的發達與否，

可以反映出一國文化程度的高低」。<sup>6</sup>在物質條件上，電影是科學的；在攝製和劇本的構成上，電影是藝術的。電影被視為現代國家文化的泉源，是由科學和文藝相互結合而產生的一個驕子。當時負責國民政府文化事業的陳立夫認為：「如果電影事業不能在中國有充分的發展，簡直是使中國所以不能進為現代國家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電影是提供人們娛樂的工具，在發展的過程中，漸漸的被賦予文化傳承與教育的使命。<sup>7</sup>這個歷程被潘公展（1894-1975）讚譽為：「這不但是科學的一種新的光彩，而簡直是整個社會文化的一種偉大的建設的力量。」<sup>8</sup>

但其實電影被創作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教育，「因為它能傳實境實物，故用作教學工具。」只是後來娛樂表演的形式取代原初教育的意義，而這是始料未及的。不過各國仍重視電影在教育上的功能，「電影是一個傳播思想和理想的新方法，實具有教育的力量，可以作教課的輔助工具」。尤其是電影是政府宣傳的最佳利器，「影響人的生活習慣，社會的理想，又能夠深入各級民眾。不僅能提高個人知識和道德水準，甚至可以改變整個人類的觀念」。<sup>9</sup>電影逐漸成為一種可供大眾娛樂、民眾導師以及教學輔助的藝術科學。<sup>10</sup>

探討國民政府時期的電影事業，必須理解國民黨在意識形態的認同。在黨國體制下的電影發展，大致可以從理論政策與實際操作兩層面去分析：

### （一）建設三民主義國家

世界各國在電影政策有所不同，大抵在集權國家，為了要控制人民思想，束

---

<sup>6</sup> 陳立夫，〈祝中國電影教育協會第五屆年會〉（1936年5月），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頁3。

<sup>7</sup> 陳立夫，〈中國電影事業的展望〉，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南京：正中書局，1934），頁1-3。

<sup>8</sup> 潘公展，〈實施電影教育的途徑〉，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頁1。

<sup>9</sup> 郭有守，《我國之教育電影運動》（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5），頁2-5。

<sup>10</sup> 姚榮齡編，《電影與檢查》（臺北：編者發行，1952），頁12。

縛人民自由，往往把電影當作教育和宣傳工具，盡量將電影與教育作結合，以利政府統治；至於在民主國家，則是注重人民衣食住行育樂的平均發展，凡是電影片的攝製，固然要顧及到教育，但同時也兼顧著藝術和娛樂功能。<sup>11</sup>國民政府是一個以國民黨為核心的政體，以黨領政是施政核心，三民主義則是一切意識形態的依據。從這個層面觀察，就不難明白國民政府在日後一切施政的緣由。

在建設三民主義國家的過程中，「同時建設三民主義的文化，而文藝勢力佔一切文化之中心」，因此完善與落實文藝政策，是國民黨所需重視的課題。其中「中國共產黨自十六年在武漢政治鬥爭失敗後，即傾其全力以從事于文藝的宣傳，所謂普羅文藝的理性論與作品在中國文藝界實佔有絕大的勢力，此種現象影響本黨革命進行至為重大」。<sup>12</sup>在面對普羅文學來勢洶洶的攻勢下，國民黨採取「某種政治手段的必要」，在文藝政策上則出臺一系列改革辦法：

- 一、確定三民主義的理論為本黨革命過程中一切文藝的原則。
- 二、中央宣傳部應設三民主義文藝委員會，各省各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同樣設立其委員，以深明三民主義而又具有文藝天才與文藝修養之本黨黨員選任之。
- 三、設立中央出版部選刊三民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
- 四、組織三民主義的文藝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 五、凡同情于三民主義的文藝團體本黨亦予以相當的扶助。

---

<sup>11</sup> 姚榮齡編，《電影與檢查》，頁 21。

<sup>12</sup>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確定黨的文藝政策」（1930 年 11 月 6 日），〈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會 3.2/18.84.1。

六、凡不違反三民主義的文藝團體本黨均以文藝上之友誼態度對待之。

七、每年由本黨撥款若干作為三民主義文藝作品獎金。

八、凡違反三民主義的文藝團體與文藝作品本黨禁止其出版與發行。<sup>13</sup>

三民主義是國民黨堅守的意識形態陣地，爭取普羅大眾對三民主義的認識與理解，是相當重要的議題。畢竟國民黨一直被詬病為菁英政黨，而與底層群眾脫節。那麼電影宣傳就成為能深入基層，扎根群眾的良好武器。但是這也產生一個問題，那些違反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文藝作品，往往會被扼殺在搖籃中，導致創作的侷限化。

國民黨電影事業最早起源於 1925 年，當時由黃埔同學會創建「血花劇社」，並在社內附設電影部分。1926 年北伐開始時，該社「以其自攝之影片數套，附於總政治部隨軍出發，由粵湘贛等省而至南京，軍行所至，每晚必放映電影，宣傳本黨主義，以與軍民同娛，所得成效甚著」。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黨中央對電影日漸重視。1929 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編撰科藝術股，開始有電影之設置，這是一個由國民黨官方正式成立的電影組織。雖說如此，這個組織之設立，「內部組織，力求簡單，且限於經費，故對於自攝影片之一切沖洗，剪接，放映以及對外電影界之聯絡，指示等工作，均未能臻於完善」。<sup>14</sup>

國民黨四全大會後，中央宣傳部改組成為中央宣傳委員會，後更因為電影事業的發展，而將原有的編審科藝術股改成電影股，改隸於文藝科之下，並擴大編制。1933 年 10 月再將電影股擴充，直隸於中央宣傳委員會，同時又在中央宣傳委員會之下成立中央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與電影劇本審查委員會。爾後又將原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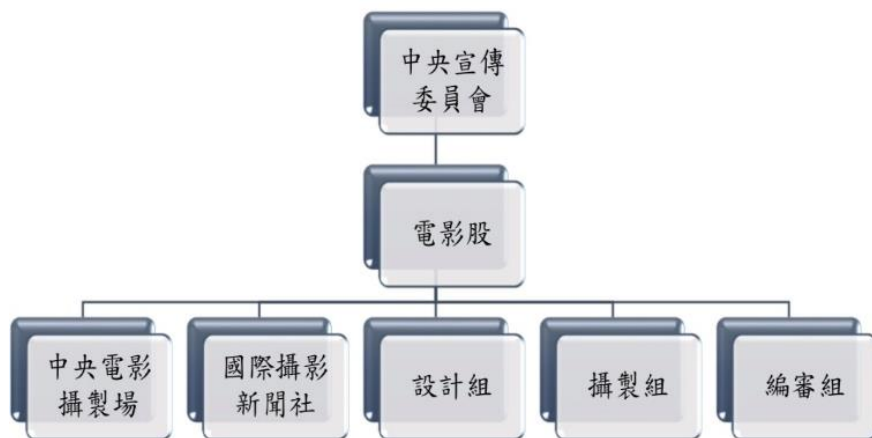
<sup>13</sup>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確定黨的文藝政策」（1930 年 11 月 6 日），〈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會 3.2/18.84.1。

<sup>14</sup>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 年》，頁 1。

屬於內政部與教育部的電影檢查委員會，改為直隸中央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至此，國民政府的電影事業可謂趨於完善。<sup>15</sup>

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股工作主要分為設計、製作、指導、編審、聯絡、映演、設置與調查等八項。電影股在攝製影片主要分為新聞、教育與戲劇三大類。在新聞影片上，電影股在各大城市均派駐有攝影師，取材當地新聞及風土人情，定名《中國新聞》運往各地演出；教育影片主要推廣科學新知，或是中國實業製造情況等；戲劇影片注重具有歷史性質故事題材，以事實作為宣傳，希望藉此達到宣傳最大效益。此外，每逢重大節慶或活動，也派人前往攝影，亦或者前往線宣揚抗日實際情況，有時也赴江西等地攝製剿共之影片。<sup>16</sup>電影股在組織上如圖 1 所示：

圖 1：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股組織系統



資料來源：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 年》，頁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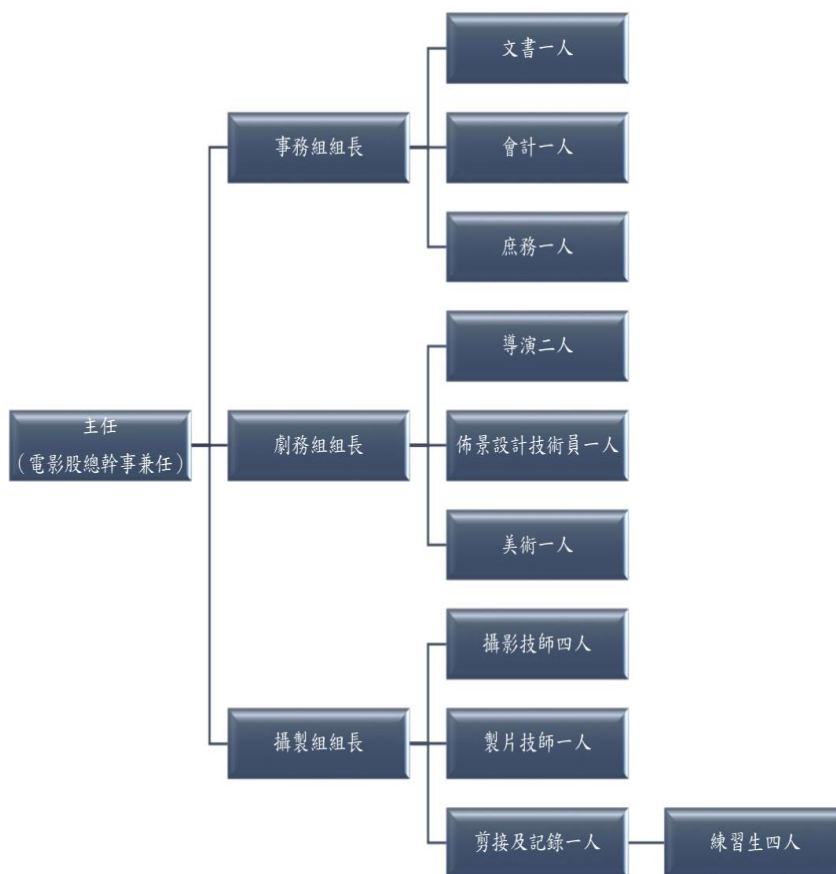
<sup>15</sup>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 年》，頁 1-2。

<sup>16</sup>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 年》，頁 2-4。

## （二）為黨喉舌：中央電影攝製場組建

為方便影片的製作，電影股在南京成立中央電影攝製場，專門負責出版官方影片，從事政府宣傳工作。中央電影攝製場內設有攝製場、化妝室、沖片室、洗片室、乾片室、印片室、捲片室、剪接室、會議室、試片室、圖書室、辦公室、影片儲藏室和電燈機器房等。在人員組織部分，如圖 2 所示：

圖 2：中央電影攝製場組織系統



資料來源：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頁 11。

中央電影攝製場真正起步階段是在張冲接任場長後。當時電影股設備極為



簡陋，只有兩架攝影機，是進口手提式的，製片工具則是手工操作，主要拍攝國民黨中央開會的新聞片，且都是無聲影片。<sup>17</sup>加上原先在南京江東門外的中央電影攝製場，「場址狹小，不敷使用」。<sup>18</sup>時任電影股總幹事的張冲認為「電影股範圍太小，應該發展。」<sup>19</sup>在張冲的規劃之下，中央電影攝製場作了以下的調整：

第一，調整了『中電』工作人員的工作分配；第二在南京玄武湖建設現代的新攝影場；第三，向美國訂購大批放映機與新式攝影機，錄音機；第四，物色已經在中國電影界具有成就的技術人材，並繼續在津、滬、平、京招考演員。<sup>20</sup>

此外，「南京風景區玄武湖進口處的小山坡那裡，很合適建造一座攝影場」，在張冲的爭取之下，新的攝影場開始籌建，並於1935年3月開始動工。<sup>21</sup>張冲對此相當重視，尤其在技術和設備方面，他囑咐：「盡量物色當時國內各電影公司中，比較有實力的導演、演員、攝影師」，「把當時國外攝影製片方面先進的器材列出清單，以便進口」。<sup>22</sup>

中央電影攝製場在南京、上海、北平三地招考演員，四百餘人報名應徵，最後通過初試審核者僅15人，競爭可謂相當激烈。<sup>23</sup>在精心籌備之下，中央電

<sup>17</sup> 〈顏鶴鳴口述歷史1〉（陳智於1996年5月27日訪問），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9），頁148。

<sup>18</sup> 〈狂風施威中央攝影場倒塌釀慘案〉，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上海：電聲週刊社，1936），頁185。

<sup>19</sup> 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頁148。

<sup>20</sup> 「中央電影攝影場開辦到現在的經過」，《一般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一般496/18。

<sup>21</sup> 〈顏鶴鳴口述歷史1〉（陳智於1996年5月27日訪問），收入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頁148。

<sup>22</sup> 〈顏鶴鳴口述歷史1〉（陳智於1996年5月27日訪問），收入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頁150。

<sup>23</sup> 〈中央攝影場考試演員〉，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頁81。

影攝影場新址在 1935 年 7 月 15 日落成。在完工儀式上，張冲在致詞中提到：

本場係於本年三月初開始興建，歷時不及四個月而完成，所費建築費及一切配件，共計四萬元，並購置最新有聲攝影機二具，無聲機四部，五千枝光燈光共計六十餘枝，亦值四萬元，兩種資產共八萬元。俱係前場長黃英同志在開支中所節餘，及中宣會經費內節省所集之款。而今蔚為大觀，其設備完全，堪為東亞唯一影場。<sup>24</sup>

為使這個東亞第一的攝影場發揮最大效能，張冲規畫未來藍圖，「六個月內，攝製新聞片三十餘部、生產建設片十二部、劇片兩部，將來映放地點，決側重於各內地鄉村，俾得收促進教育文化之速效。預計將來放映處，可有百餘處，散佈於全國」。<sup>25</sup>這不僅可以促進電影事業與文化教育之間的聯繫，更期待能使國產電影在東亞市場佔有一席之地。<sup>26</sup>

中央電影攝製場設置之初，直屬於電影股管轄，主要工作有兩項：「一、攝製本黨所需要之各種影片，以建樹純正的電影作風；二、搜集電影技術人才，訓練成為本黨之電影專家。」<sup>27</sup>出品計畫則有：「一、新聞片每月出片最少三本；二、教育片全年最少出片四套；三、戲劇片全年最少出片二套。」<sup>28</sup>中央電影攝製場在張冲的主持之下，「逐步實現了中電的需求」。<sup>29</sup>

中央電影攝製場作為國民黨的宣傳機構，為黨喉舌是主要任務，除拍攝新聞影片外，基於政治需要也會拍攝一些對國內外宣傳的教育影片，當中反共戲劇或紀錄片，更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國內重大的活動或慶典，也是中央電影攝製場

<sup>24</sup> 〈中央有聲攝影場昨日舉行落成禮〉，《中央日報》（南京），1935 年 7 月 16 日，第 2 張版 3。

<sup>25</sup> 〈中央有聲攝影場昨日舉行落成禮〉，《中央日報》（南京），1935 年 7 月 16 日，第 2 張版 3。

<sup>26</sup> 〈中央有聲攝影場建築費僅三萬餘〉，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頁 42。

<sup>27</sup>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 年》，頁 11。

<sup>28</sup>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 年》，頁 11。

<sup>29</sup> 「中央電影攝影場開辦到現在的經過」，《一般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一般 496/18。

專注的焦點，例如在 1935 年 11 月 25 日，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1883-1937）準備由青海返藏，國民政府特派人員赴青海陪同班禪一同入藏。張冲鑒於「藏地遠處邊陲，交通不便，致內地民眾，對於藏地一切情形，均異常隔膜，故特派該場攝影師黎錫勳等，隨行入藏，沿途往返，攝製影片，將藏地風俗習慣、名勝風景、政治建設等攝入」。<sup>30</sup>這類紀錄影片，不僅可以讓國人瞭解中國各地人物風景，更將這些歷史畫面的珍貴鏡頭記錄下來。

為加強國人的愛國心，張冲也籌劃拍攝大型戰爭片，於是有了《戰士》的出品。這部影片於 1936 年 4 月 24 日正式上映，是中國第一部有聲革命戰爭片，由余仲英導演，顏鶴鳴擔任攝影，影片內容是「紀革命軍抗敵之慷慨激昂！寫我先烈就義之奮鬥犧牲！」<sup>31</sup>以國軍北伐為故事背景，在宣傳廣告上稱：「本片在未公映前，早已轟傳遐邇，毋庸吹噓。」<sup>32</sup>《戰士》影片「題材刺激，著當時的時代背景，因為當時中國電影公式化的題材已感厭膩，而以戰事的充滿著革命情緒的電影，會給觀眾發生新的需要而受歡迎。」<sup>33</sup>拍攝用意主要是喚醒民眾對政府的信心，也宣傳國軍為人民福祉而犧牲奉獻的精神，這是一般民營電影公司較少涉及的拍攝領域。

除了官方利用電影作為宣傳與教育用途之外，民間也不妨多讓，在面對日本的侵略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意識往往更能深植人心，而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 1935 年由許幸之（1904-1991）導演的《風雲兒女》。這部影片主要講述在九一八事變後，流落上海的東北青年人最後投入抗日行列的故事。<sup>34</sup>主角袁牧之（1909-1978），所演唱電影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在被冠上政治符號之前，是一首簡短有力，慷

<sup>30</sup> 〈中央攝影場派員赴西藏派攝影片〉，《中央日報》（南京），1935 年 11 月 26 日，第 2 張版 3。

<sup>31</sup> 〈中國第一部有聲革命戰爭片〉，《申報》（上海），1936 年 4 月 24 日，本埠增刊版 6。

<sup>32</sup> 〈中國第一部有聲革命戰爭片〉，《申報》（上海），1936 年 4 月 24 日，本埠增刊版 6。

<sup>33</sup> 「中央電影攝影場開辦到現在的經過」，《一般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一般 496/18。

<sup>34</sup> 〈風雲兒女〉，《時代》，卷 8 期 1（1935 年 5 月），頁 28。

慨激昂的抗日歌曲。這部電影宣傳救亡圖強，抗敵禦侮的精神，鼓舞著不少人在槍林彈雨之中踏上抗日征途。另外袁牧之在 1937 年出品的《馬路天使》，搭配中國當時著名演員周璇（1920-1957）為主角。周璇在劇中飾演一名由東北流落上海賣唱的女子，在當時電影檢查之下，凡有反日言論的影片都在政府取締範圍，因此只能將抗日意涵藏在片中不起眼的角落，使得本片充滿著民族意識，成為影響深遠的經典代表。<sup>35</sup>

### （三）從電影股到電影科

國民政府為因應電影事業的日益發展，「凡整個與電影事業有關之工作，如國內電影事業之設計、指導、聯絡、國外電影事業之調查、電影片之檢查、電影劇本與電影文字之審查，以及中央宣傳影片照片之攝製、放映與分配等，均已發生重要及密切之聯繫。」但整體缺乏規劃，「組織各自分立，系統未能明確，致工作進行難以盡量發展」。<sup>36</sup>

1935 年 4 月 10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鑑於電影事業的發展，「為通過電影工作效能，擬改本會電影股為電影科，充實組織以利進行」。<sup>37</sup>「科長一職，查有原任電影股總幹事張冲同志，對於電影宣傳工作，夙富經驗，自主持該股事務以來，一切擘畫，悉中機宜，成績斐然。」<sup>38</sup>會中指出此次電影股改組原因：

查電影為推進現實宣傳工作，及輔導民眾教育最優良之工具，歐美各國無不竭力追求於一國家電影事業之經營與控制。如現今德、義、蘇俄等國，甚至以此為實現政治主張之唯一宣傳工具。關於管理電影事業上之組織，

<sup>35</sup> 〈電影影評：馬路天使〉，《電聲週刊》，卷 6 期 30（1937 年 7 月），頁 1287。

<sup>36</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擬升任張衡為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科科長案》（1935 年 04 月 10 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 4.3/186.24。

<sup>37</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為增進電影工作效能擬改對電影股為電影科案》（1934 年 12 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 4.2/34.24。

<sup>38</sup> 擬升任張冲為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科科長案（1935 年 04 月 10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會 4.3/186.24。

均有一強有力之統制機關。我國電影事業雖不能與歐美各國相頡頏，然對管理電影事業之組織，在本黨統制之下，不得不謀設立一中心組織，以期一方面負起領導國內電影事業之責，他方面復可充分表現其自身之力樣。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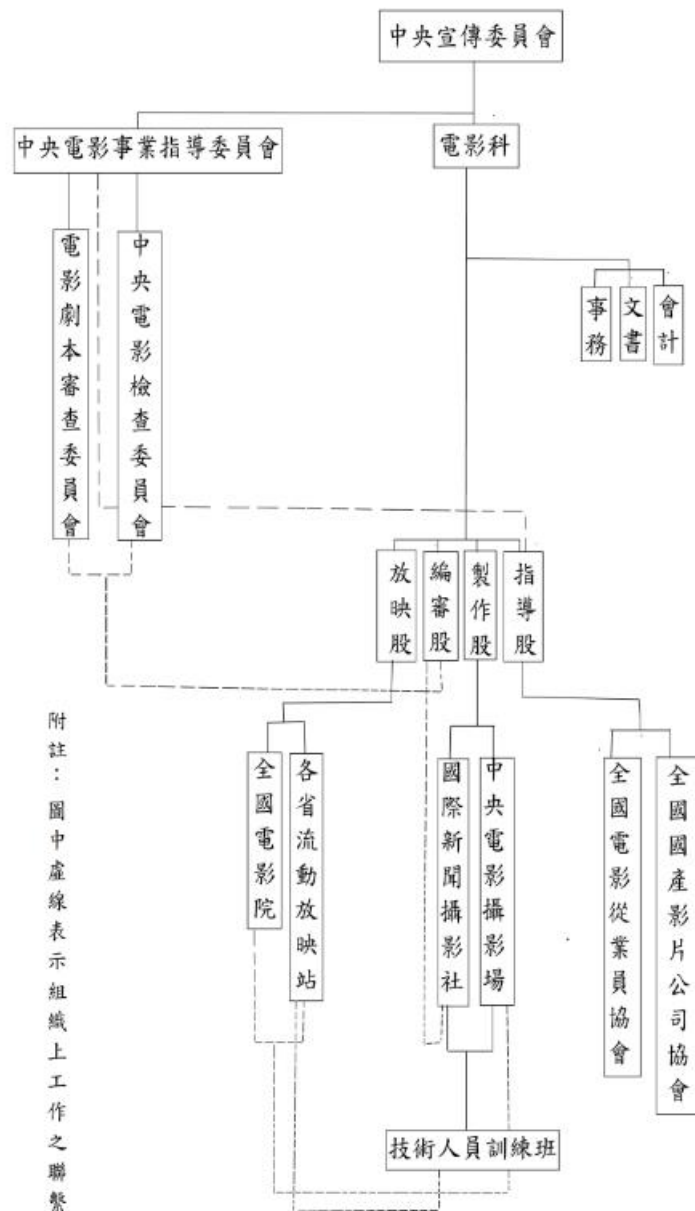
在新的電影科下設立指導、製作、編審、放映等四股，每股設總幹事一人，幹事及助理若干人。<sup>40</sup>至此電影事業邁入一個新臺階。在電影事業組織架構的配置上，如圖 3 所示：

---

<sup>39</sup> 「為增進電影工作效能擬改本對電影股為電影科案」（1934 年 12 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會 4.2/34.24。

<sup>40</sup> 「為增進電影工作效能擬改本對電影股為電影科案」（1934 年 12 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會 4.2/34.24。

圖 3：中國國民黨電影事業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為增進電影工作效能擬改本對電影股為電影科案」(1934年12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會 4.2/34.24。

當電影股升格為電影科後，張冲對未來工作提出一些想法，他說：「一、設電影場攝製中國所需要的影片；二、指導中國電影教育；三、聯絡檢查；四、放映部，將影片由城市普及到鄉村，使四萬萬國民都能夠受到相當的教育。」<sup>41</sup>雖說國民政府在電影政策上，有其意識形態的目的，但不能否認的是，透過電影的普及，確實給偏遠地區的弱勢民眾帶來世界的新知，開闊他們的視野。

#### （四）張冲對電影事業的規劃與構想

電影是最能獲得大眾歡迎的藝術，也最能貼近民眾生活，在科學力量的幫助下，具體地表現出人生百態。<sup>42</sup>國民政府時期，電影在「中國固有文化低落和民族意識消沈」之際，負起責任以完成對國家民族的使命。<sup>43</sup>在這個背景下，張冲認為：「電影，無疑地在現代中國內已成為復興民族的唯一文化工具了。」尤其在主持電影事業後，張冲計畫利用電影「恢復我們的固有文化以支持我們民族」，成為首要的課題。張冲提出電影是「一種新的力」的概念，以此發揚民族精神，加強民族意識，要求每一位從業的電影人不能違背國家和民族的立場。此外，扶植國產影片是張冲所努力的方向，他認為：「我們民族的偉大性、建設性，以及一切亘古常的光芒」，如此才能與「西洋輸入影片相對壘」，讓「外片絕跡於國內」。<sup>44</sup>

再者，中國有龐大的文盲，加上科學實力無法與歐美國家相比，在國勢危如墜卵之際，「我們正需要一種新奇的宣傳工具，使全國民眾都能夠明瞭我國處在這種危險地位非常精神團結不能救亡圖存，電影便是我國目前最需要的宣傳工具」。

---

<sup>41</sup> 〈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科科长張冲致詞〉，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四屆年會》（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5），頁9。

<sup>42</sup> 陳立夫講述、王平陵筆記，〈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應負的使命〉，《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頁31。

<sup>43</sup> 方治，〈中國電影界應負新運的使命〉，《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1期1（1934年4月），頁21。

<sup>44</sup> 張冲，〈電影—一種新的力〉，《華聯畫報》，卷5期2（1935年1月），頁2；泊泊，〈張冲宴請電影界希望外片絕跡於國內〉，頁931。

關於這個議題，張冲提到：

電影所表演的是人生的各方面，影片的內容和中心意識具有偉大的力量，小則影響個人的身心，大則有關社會的安寧，因為電影本身實在是一種社會教育，它的功效可以灌溉智識，傳達政令，移風易俗，並且還可以輔助學校教育的不足，救濟教科書圖畫標本和儀器的缺點。<sup>45</sup>

特別是英、德、蘇聯與美國都在提倡本國電影工業時，中國又面臨各國影片侵略無為不至，如何與外國影片對抗，以加強「國產電影的重要與責任」。張冲無奈表示：「國人努力投資電影事業，改進攝製影片技術，和培植影界人才外，還有什麼辦法呢？」<sup>46</sup>

1935 年正逢蘇聯電影事業 15 週年之際，張冲特別撰文來介紹蘇聯電影，希望借此來吸引民眾在電影議題上的目光。張冲提到蘇聯自列寧（Лéнин, 1870-1924）到史達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878-1953），都非常看重電影事業，「蘇俄電影，傾心經營，十五年於茲，其成果之偉大，殊出人意料之外」。張冲強調蘇聯的各項建設，因為其特殊的「政治型態」，都含有「統制性」與「計劃性」，而這一點在電影事業上亦然。尤其在電影工業、電影教育的發行與影片放映上，都有「通盤計畫」，因此能在短時間能達到最大效果。蘇聯影片除了戲劇片外，針對政治、軍事、新聞（各種紀錄片）、反宗教、衛生體育、兒童、勞工、工廠安全、農業等富有教育與科學的影片特別注重。蘇聯在電影事業上，力求普及化與大眾化，「充分利用電影發揮其教育及宣傳之作用」。<sup>47</sup>蘇聯在電影事業的政策，或多或少影響到張冲主持電影後的思想變化。<sup>48</sup>

電影是科學與藝術的結晶，「不但能把觀眾在時間上、空間上覺察不到的東西，

<sup>45</sup> 張冲，〈國產電影的重要性與責任〉，《西北電影》，創刊號（1935 年），無頁碼。

<sup>46</sup> 張冲，〈國產電影的重要性與責任〉，無頁碼。

<sup>47</sup> 張冲，《蘇聯電影事業》，《中國與蘇俄》，卷 2 期 1（1935 年 10 月），頁 1-3。

<sup>48</sup> 「張冲人事資料」，〈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登記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9000002685A。



用藝術的方式，憑攝影的技巧，收集起來。在銀幕上表現，還能把人生的社會的各種情態，如實表現給觀眾更深刻的印象」。既然電影能帶給人們如此大的效果，「將來人類的智識都要由電影供給」，各個國家便將電影與教育連想在一起，「電影教育」就成為當時一項重要的議題。在張冲看來，電影教育有廣義與狹義的分別。在廣義的部分，他認為：「凡是一切的電影，尤其是在戲院映演的娛樂影片或戲劇影片，都含著教育的意義」；從狹義來看：「凡是學校教學片、宣傳片、新聞片，以及體育衛生等影片，都是純粹的教育影片。」中央電影攝製場成立後，便積極的拍攝新聞影片，如公路、鐵道、電政、蠶絲，以及交通安全、工廠安全」等影片外，也有不少關於國民革命的史實戲劇片的攝製。為此張冲呼籲：「今後電影作品取材方面，應側重民族意識，負起時代使命，已為國家社會謀求最大貢獻！」

49

### 三、電影檢查的落實與執行

電影從誕生之初，到日後快速的發展，逐漸成為「高等的科學家，偉大的藝術家與寓于表現個性的演員底工作最好的代表」，是普羅大眾生活不可或缺的娛樂。不過由於電影質量的參差不齊，導致片商為迎合大眾，拍攝許多低品質的影片，近而影響社會風俗，使得電影檢查被抬上日程。「電影檢查在關於文化的水準與電影事業的產品上，是一種最重要的元素」。也正如此，「有的由政府對全國的電影檢查事業，作有計劃的統制或輔導，有的由政府對已製成的影片，執行事後的檢查和取締」。<sup>50</sup>既然電影檢查如此重要，世界各國也紛紛設立電影檢查組織，來實行統制措施。由國際聯盟組織下的國際電影檢定委員會，曾作出如此決議：

在電影檢查方面，不僅是限於影片的本身，就是廣告，說明和在節目中所包括的五花八門的遊藝，都要一律加以檢查。官廳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對於淫猥影片是要加以嚴格取締，即是參加該片製造，運輸出口和分配的人

<sup>49</sup> 張冲，〈電影教育研究：中國電影教育的使命〉，《教與學》，卷1期8（1936年2月），頁57-59。

<sup>50</sup> 姚榮齡編，《電影與檢查》，頁19-20。

們，在經過法庭的審判後，應負責的加以處罰。在各國，也應真實地強制下組織一種國際委員會來考核這種檢查制度，而且要在檢查電影上一種契約，這種契約可以使國與國之間的影片交易照原片一絲不改的交易起來，在另一方面，電影檢查也很樂於尊重影片底藝術性質，這樣對於著者底本來概念不致因剪裁而被毀壞。<sup>51</sup>

決議中除了對影片本身內容檢查，同時在字幕、廣告以及遊藝方面也需要注意。<sup>52</sup>因為有電影的媒介，「使國際間各國更形親密，它是國際間好意的最有力的工具」。再者，「沒有其他的媒介物具有電影同樣的能力來同情地喚起一個國家的性格和使外國觀眾瞭解它」。電影是宣傳與教育的工具，用來傳遞使命，灌輸思想，「當作國際間交接方法之最高的重要」。檢查那些「淫亂與不適當的題材」和打擊那些違反社會道德的影片，似乎就成為趨勢。<sup>53</sup>

電影檢查是國際的共識，打擊違反公認道德的影片是原先的初衷，雖說電影檢查也被批「公然違背言論與思想自由」，許多影片也成為電影檢查員剪刀下的犧牲品。但世界各國卻也不肯放棄電影這個宣傳的重要工具，「因其政府的社會體制的利益而有不同的標準，除掉大眾已掌握文化的武器底國家而外，各國的政府都是在積極方面獎勵製作為本身地位作宣傳工具底影片，更在消極方面設立嚴格的檢查機關來取締一切違反其本身利益的影片」。<sup>54</sup>

當時中國在電影檢查上，起步相對於其他國家來得遲。電影自清光緒年間輸入中國後，「對於電影以前採取放任主義，不但積極的政策沒有，及消極的限制也

---

<sup>51</sup> 楊昌溪譯述，〈論電影檢查的意義〉，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頁9。

<sup>52</sup> 楊昌溪譯述，〈論電影檢查的意義〉，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頁6。

<sup>53</sup> 費鑑照譯，〈國際電影檢查〉，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頁1-2。

<sup>54</sup> 舒湮，〈中國的電影檢查〉，《影迷週報》，卷1期4（1934年10月），頁68。

沒有。電影可以不經檢查，自由開映」。這現象導致外國「海淫海盜」的影片充斥市場，徒增加民眾「盜匪綁匪的知識與技藝而已」，「社會生活的浪漫頹廢，城市罪惡增多」，這當中不乏辱華影片。至於國產片呢？，由最初家庭議題的題材，逐漸由古裝表演轉入武俠神怪影片，以迎合觀眾口味，進而造成社會不良影響。<sup>55</sup>

1928 年國民黨取得全國執政權，開啟了訓政時期。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的核心價值，而訓政就是由國民黨代為行使政府職權，以黨治國。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為加強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利用電影促成三民主義之實現及輔助各種事業之進行」，因此凡有「違反三民主義者」的影片，都在禁止之列。再者，當時中國電影事業無法與歐美各國相提並論，無論從藝術上或是技術上。而國產影片又無法與外來影片抗衡，加上這些「舶來影片大半為肉感及浪漫作品，其所給與我國觀眾之印象，只能引起趨向到享樂或消沈方面」。購買這些外來影片又耗費極大費用，更重要的是當時電影界神怪迷信片的盛行。1929 年 4 月 23 日，行政院就令教育部及內政部兩部，訂定《電影片檢查規則》，提出：「我國電影事業日形發達，所有影片內容必須經過審查，避免於社會風化有所妨礙。」該規則於 7 月 1 日正式公佈施行。隨著《電影片檢查規則》施行，神怪武俠影片的流行風潮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sup>56</sup>

《電影片檢查規則》共十六條，在該規定第三條提到：「檢查電影片在特別市由公安局、社會局、教育局會同辦理。」因此就有了上海特別市電影檢查委員會的創立。<sup>57</sup>9 月 12 日，上海特別市電影檢查委員會的成立，這是國民政府第一個官方電影檢查機構。之所以在上海成立，是因為上海是當時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是全國電影的製作、發行與放映出口中心。這裡無論在人口、文化、教

<sup>55</sup> 郭有守，《我國之教育電影運動》，頁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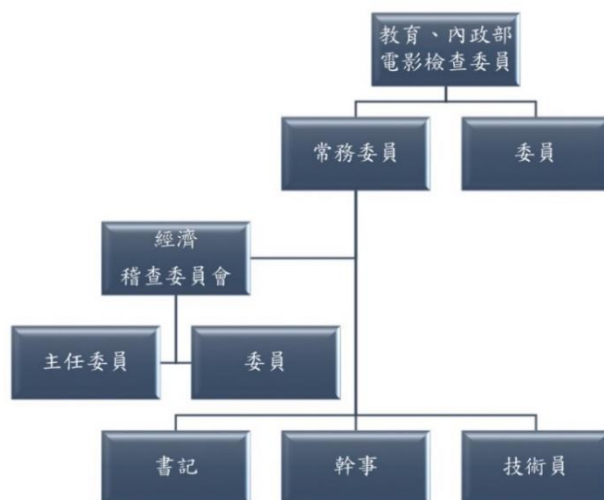
<sup>56</sup> 《電影片檢查規則》（1929 年 4 月 23 日），《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100-00002-001。

<sup>57</sup> 上海市電影檢查委員會，《上海市電影檢查委員會業務報告（民十八-廿二年度）》（上海：上海市電影檢查委員會，1931），頁 9。

育等各層面都列居全國鰲頭。上海不僅是國際都市，也是中國對外的櫥窗，如在此地實踐成功，那麼推廣到全國各地，便指日可待。總觀中國電影檢查制度，由自願而強制，由個別到普遍，由民間到官方，再由地方到中央。國民政府主政之初，在上海施行的電影檢查制度，就成為承先啟後，承上啟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sup>58</sup>

1930 年 11 月 3 日，國民政府頒布《電影檢查法》，並訓令由內政部、教育部兩部會擬定《電影檢查法施行規則》，同時擬定電影檢查委員會組織章程。隔年 3 月 1 日，電影檢查委員會正式成立。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員參加，並指導檢查工作。<sup>59</sup>關於電影檢查委員會組織架構，如圖 4 所示：

圖 4：電影檢查委員會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編，《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工作總報告》（南京：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1934 年），頁 5。

<sup>58</sup> 汪朝光，《影藝的政治—民國電影檢查制度研究》，頁 52。

<sup>59</sup> 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編，《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工作總報告》（南京：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1934），頁 3。

電影檢查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即宣示：「查國內製造電影片公司林立，出品繁多，良莠不齊，深怕不良影片因國內不准映演，將偷運出國，在外洋各地映演，苟不澈底查禁，則影響所及，不獨有妨風化，抑且損及國體。」<sup>60</sup>如不對影片加以檢查給於執照，「恐有奸商於屬會耳目不及之地，將無執照之不良影片，改變內容，迎合社會，以圖牟利，則其流毒及於風俗人心，必非淺鮮」。<sup>61</sup>電影檢查委員會主要工作則有：「一、取締初期神怪武俠影片；二、注意國產影片公司改變作風；三、注意侮辱國體之各外片；四、告誡全國電影界；五、公佈電影片期滿後於規則；六、劃一電影廣告。」<sup>62</sup>

在工作執行上，電影檢查委員會依據《電影檢查法》及檢查標準，對各項影片做審查，「對外國進口片檢查尤為嚴密，如稍有違背檢查片者，均予禁演，或加以修剪後准演，即浪漫及富於肉感等不適合於我國淳原風尚之影片均嚴予取締。」在國產影片上，「注意其作品內容，及藝術上之結構，總之誘掖和導，以扶植國產影片之發展為主旨，如有不當之處即由本會步悼煩瑣，予以修剪，或發還原公司自行改製，決不姑息寬縱也」。<sup>63</sup>總計從 1931 年 6 月至 1933 年 6 月止，電影檢查委員會共核准 618 部國產影片，題材類型前五名依序為社會題材的 165 部，佔 26.7%，其次為愛情類 53 部，佔 8.6%，第三名為新聞類型 34 部，佔 5.5%，第四、五名為傳說及武俠類，各 32 部，佔 5.2%。<sup>64</sup>

不難發現，關於神怪武俠或偵探題材仍佔有一定的比例。不過從《電影檢查

<sup>60</sup> 〈電影檢查委員會呈：為請會咨財政部轉飭各海關查禁偷運出口電影片〉（1931 年 4 月 7 日），《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 1 期 1（1932 年 8 月），頁 18。

<sup>61</sup> 〈電影檢查委員會呈：為請通令頒布各省市檢查電影片報告表〉（1931 年 5 月 25 日），《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 1 期 1（1932 年 8 月），頁 19。

<sup>62</sup> 羅剛，〈中央電檢會工作概況〉，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 年》，頁 1-2。

<sup>63</sup> 〈本會檢查影片一覽〉，收入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編，《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工作總報告》（南京：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1934 年），頁 1。

<sup>64</sup> 〈准演國產影片一覽表〉，收入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編，《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工作總報告》，頁 1-22。

法》公布後，政府在電影檢查執行的力道逐步加強，從 1931 年 6 月至 1934 年 2 月為止，遭禁演的國產影片多半是違反《電影檢查法》第二條第三款的「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者」，以及第二條第四款的「提倡迷信邪說者」。<sup>65</sup>此階段對於電影檢查要求仍著眼於社會道德規範。電影檢查委員會對此作出這樣的結論：

數年前，國產影片公司，利用一般民眾淺薄心裡，攝製武俠等片，其內容不外誨淫誨盜及提倡迷信邪說，其技術又異常低劣。自本會成立後，為正風俗，去迷信，及提高電影藝術起見，特予以嚴格之取締，督促各國產影片公司，勤求進步，改製佳片。<sup>66</sup>

電影檢查委員會曾數度邀請各大電影公司代表來談話，這讓「國產影片公司自知神怪武俠等片不合時代潮流，易趨於淘汰之列，乃相繼改變作風描寫現實社會生活」。在檢查外國影片方面，主要著重在是否侮辱華人之表演，以「維護中華民族尊嚴及國家地位」。此外，1934 年正值「抗日剿匪期間」，特別在非戰思想影片加以取締，例如《西線無戰事》，以及英國公司出品的《前進》，都因「寓有非戰思想」，而予以禁演。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影片的審核，1929 年中東路事件後中蘇絕交，期間凡是蘇聯影片一律拒絕檢查。不過在 1932 年中蘇復交後，始開始恢復蘇聯影片的引進與檢查。在檢查蘇聯影片《金山》時，「曾由中央黨部指導員介紹中央黨部熟習俄文之某同志偕其俄籍夫人來會擔任翻譯，經數次檢查考慮後，並將群眾搗亂一段八公尺剪去，始予通過」。<sup>67</sup>綜觀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唯有張冲深黯俄語，同時有一位白俄籍夫人娜達，且他又在陳果夫、陳立夫的提拔之下，漸漸的涉略中國電影事業。

為強化電影檢查，1933 年 9 月成立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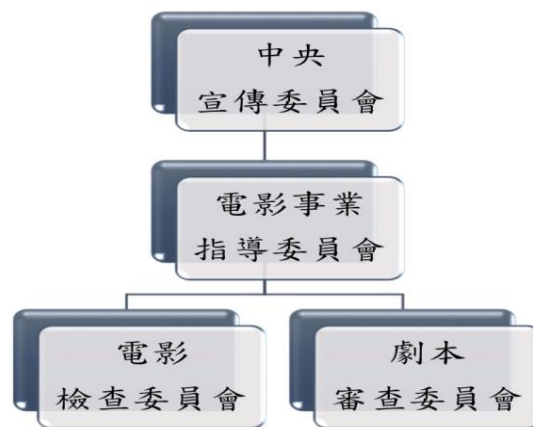
<sup>65</sup> 〈禁演國產影片一覽表〉，收入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編，《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工作總報告》，頁 1-4。

<sup>66</sup> 〈電影檢查委員會成立三年來工作述要〉（1934 年），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第 5 輯第 1 編文化（一），頁 393。

<sup>67</sup> 〈電影檢查委員會成立三年來工作述要〉（1934 年），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1 編文化（一），頁 393-394。

組織目的主要有五項：「一、指導全國電影事業；二、設計電影宣傳工作；三、設置電影劇本審查委員會審查電影劇本；四、設置電影檢查委員會檢查電影片；五、中央宣傳委員會交付研究事項。」1934年3月，通過《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組織大綱修正條例》，其組織大綱如圖5：

圖5：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組織系統



資料來源：中央宣傳委員會，〈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組織大綱〉（1934年3月），《會議記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2.3/130.12。

在電影劇本及影片審查上，主要著重在是否宣傳三民主義，表現國民革命之精神，宣揚中華民族傳統精神或是歷史優美文化，同時也注意倡導科學新知，破除封建迷信的內容。此時國民政府在宣傳上著力相當深。

隨著《電影檢查法》的通過，與電影檢查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國民黨在意識形態宣傳上進入實際的運作模式。這一檢查制度，在查禁神怪武俠影片上有著一定的成效，也與後來興起的左翼電影爭奪輿論的主導權，強化統治的合法性與剿共的合理性。但最終隨著電影檢查委員會被併入到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之下，弱化教育部與內政部的職能，電影檢查制度也就徹底納歸國民黨電影統治架構中，成為執行黨意志最佳的利器。<sup>68</sup>

<sup>68</sup> 汪朝光，《影藝的政治—民國電影檢查制度研究》，頁51。

1934年3月23日，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集全國電影公司負責人，在南京舉行談話，藉此希望瞭解電影界實際需求，以及對政府的各項建議。各電影公司負責人總計提出三點建議：

- 一、希望審查影片能有統一辦法，即審查標準統一，同時中央與地方審查要能一致，應免中央審查准映之影片，再遭地方審查會剪接。
- 二、希望中央對每一影片之精華，非萬不得已時，不予剪去。
- 三、希望中央扶助製片業及影院之發展，尤其是在內地影業，希望中央幫助進行。<sup>69</sup>

上述的建議不難發現，各電影公司主要希望政府在電影檢查上能予以放寬，需制定統一標準。畢竟這些影片都是電影公司耗費成本所拍攝，如遭過度刪剪，必然會造成損失。再者由於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如政府能在各地建立電影院，扶植國產影片，想必能為各電影公司帶來龐大的利益與市場。面對電影界的這些呼聲，尤其是盼望「中央對每一電影之精華，非萬不得已時，不予剪去」的建議，國民黨中宣會主任委員邵元冲（1890-1936）非但沒有理會，反倒警告說：

今後我們祈求著量的增加，同時並祈求著質的改進，大凡一個意識曲折的故事假使搬上銀幕，無論表現的技巧怎樣工巧，終歸是失敗的，那些意識不正確的影片，不但妨礙到電影事業本身的發展，而首蒙其害的，恐怕還是整個民族的生命，所以中國電影界，對於電影作品的取材，換句話說，就是電影的意識問題，實不能不嚴格的注意。<sup>70</sup>

這些話明確的指出，凡是有違背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影片，無論無何優秀，如何精華，都會是政府檢查的重點。他強調稱：「電影的力量，是高於一切，文字的宣傳」，

<sup>69</sup> 〈電影談話會開幕〉（1934年3月23日），《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1期1（1934年4月），頁17-18。

<sup>70</sup> 〈邵主任委員發表中國電影界應當注意的幾件工作文云〉，《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1期1（1934年4月），頁19。



需要多拍攝「關於喚起民眾精神的片子」，來「挽救沉淪的中國的命運」，如此才能吸引觀眾對於建設的興趣，「而使他們贊助政府，積極建設，俾各種建設計劃，早日完成，這是電影界必須從事的一件偉大工作。」<sup>71</sup>「反對意識不正確影片」與「贊助政府」，顯現出國民黨在電影檢查制度上的特質及目的。<sup>72</sup>

1934年11月25日晚，時任電影股總幹事張冲邀請當時電影界數一數二的人物，及中央電影攝影場各位顧問。此次的邀宴讓與會人士感到張冲積極聯絡電影圈的誠意，與政府振興國產電影的企圖，因此這次的赴宴，讓大家感到「有相當重要的意義」。<sup>73</sup>席間張冲表示：

中央攝影場與各影片公司絕沒有什麼衝突，它專播黨的光榮歷史，或政治的紀錄等作品，這些大都民間的公司不太愛攝製的。至於我們的敵人，則絕非甲公司或乙公司，而是舶來片。我們希望有一天能使外片絕跡於國內市場。<sup>74</sup>

從談話中可以看出，張冲對振興中國電影事業，有著相當宏大的理想與抱負。張冲對未來電影拍攝內容作一番規範，他認為影片「不妨描寫窮人，若是專拍富者享樂生活，也會令人感到厭膩，同樣的，也無須得以窮人的描寫為唯一題材」，希望將電影片多元化，觸角能深入社會各個階層。<sup>75</sup>

張冲在對電影圈人士打過招呼後，便全面清查全國的電影公司，對於那些「神怪荒誕影片之流行，足以影響社會教育，為害最深」的影片加強取締。這些影片，「其內容既極淺薄，而所演之故事，又不外取諸坊肆無聊說部，非提倡迷信，既

<sup>71</sup> 〈邵主任委員發表中國電影界應當注意的幾件工作文云〉，頁20。

<sup>72</sup> 汪朝光，〈影藝的政治：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研究〉，《歷史研究》，2006年2期，頁66。

<sup>73</sup> 〈短訊：張冲大宴顧問先生〉，《影畫》，卷1期19（1934年12月），頁434。

<sup>74</sup> 泊泊，〈張冲宴請電影界希望外片絕跡於國內〉，《電聲週刊》，卷3期47（1934年9月），頁931。

<sup>75</sup> 泊泊，〈張冲宴請電影界希望外片絕跡於國內〉，頁931。

屬誨盜之表演，設不加以取締，任其流毒社會，麻痺人民心理，實非所宜」。<sup>76</sup>

1935年1月初時，張冲帶著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人員，同時商請上海市公安局派出特務股的警務人員，協助搜查各大電影公司，當場查獲違法禁片，及攝影機件等，並拘留相關人員。<sup>77</sup>其中涉及共產主義內容的影片，更是查禁重點，例如1月19日，上海大光明戲院即將上映的生活影片，內容宣傳共產主義，且「現映國際大秘密一片，中有共黨國際歌及少年先鋒歌，亦未刪剪，殊為不妥」，大光明戲院就遭蔣中正（1887-1975）下令「撤銷執照，禁止放映」。<sup>78</sup>同時要求遭查禁的電影公司與負責人處以四項懲罰：「一、飭各該公司將所有禁片及舊片一律繳呈本會；二、罰款示懲；三、具悔過書；四、俟能依法成立公司發還機件。」<sup>79</sup>如此大規模的查禁違禁影片氛圍下，張冲此舉無異給電影界一個下馬威。

張冲接任電影股總幹事後，在電影檢查執行上確實下了不少力量。許多不符合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影片，或是無教育意義的都在打擊行列，尤其是神鬼怪誕類型的電影。為合理化國民政府在電影檢查上的正當性，「我國電影事業正當初期發展，對於電影之出品，自應力加慎重注意，俾免踏入粗製濫造之途」，要求片商在拍攝過程中，務必符合政府規範，如此才能避免「無謂損失」。<sup>80</sup>

從1934年5月至1936年3月間，電影檢查委員會所核准的國產電影種類，仍以社會與愛情題材佔最大比例，分別各約58.2%、9%，第三名為滑稽8.2%，第

<sup>76</sup> 〈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主任羅剛呈中央宣傳委員會為清查神怪禁片及擬定處置辦法呈文〉（1935年1月17日），《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2期1（1935年2月），頁4-5。

<sup>77</sup> 〈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主任羅剛呈中央宣傳委員會為清查神怪禁片及擬定處置辦法呈文〉（1935年1月17日），頁5。

<sup>78</sup> 「潘公展電蔣中正請立令電檢會撤銷大光明影戲院准映執照禁映生活影片及國際大秘密兩片」（1935年1月），〈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201-131。

<sup>79</sup> 〈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主任羅剛呈中央宣傳委員會為清查神怪禁片及擬定處置辦法呈文〉（1935年1月17日），頁5-6。

<sup>80</sup> 〈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主任羅剛呈中央宣傳委員會為清查神怪禁片及擬定處置辦法呈文〉（1935年1月17日），頁4。

四名為倫理 4.1%，第五、六名為歌舞、戲劇各 2.5%，第七名為雜技 1.6%，其餘題材皆不足 1%。<sup>81</sup>國產短片則以新聞 64%位居榜首，其次則為滑稽及戲劇 6.2%。<sup>82</sup>至此，神鬼怪電影基本消失在電影界。許多不符合國民黨意識形態或政策要求的電影，多半被扼殺在搖籃，或是不予以核准放映。電影公司為了不讓心血付諸東流，或是成本難以回收，只能往政府認可方向去拍攝影片。而這倒也讓國民黨在電影宣傳上逐步取得話語權，也為張冲在電影界樹立一定程度的威望。

#### 四、電影教育與《農人之春》

1932 年國際聯盟設立「國際教育電影協會」，希望藉此消除民族隔膜，倡導人類和平，認為「電影是教育是最易收效的工具」，下令各會員國組織教育電影協會，而身為會員國的中國，自然不能自身事外。<sup>83</sup>當時中國電影事業尚屬幼稚階段，國產電影「忽略了電影教育的要件，而僅僅從事於娛樂資料的供給，有些為了增加利益的獲得，不惜以大量的金錢，攝製神怪荒誕的影片，來迎合一般低級觀眾的心裡，使整個社會受了不良的影響」，加上歐美各國電影事業的進展，連帶影響到中國發展。<sup>84</sup>

1932 年 7 月 8 日，由陳立夫、朱家驊（1893-1963）、葉楚傖（1887-1946）、郭有守（1901-1977）及羅家倫（1897-1969）等五十餘人共同發起的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在南京召開成立大會。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為當時國內最高電影指導機關之一，在成立大會上明確指出創建的緣由：

我國電影事業，較為幼稚。其所出品，雖不乏佳構，但求其足以輔助教育，

<sup>81</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兩年來國產影片本事彙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頁 3-8。

<sup>82</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兩年來國產影片本事彙刊》，頁 9-12。

<sup>83</sup> 方治，〈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的使命〉（1936 年 5 月），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頁 5。

<sup>84</sup> 陳立夫，〈祝中國電影教育協會第五屆年會〉（1936 年 5 月），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頁 3。

宣揚文化，實未多見。同人有鑒於此，欲有以促進之，俾教育賴電影而功效益宏，電影為教育而有力所注；從事於教育影片之研究編製，內與全國教育學術界通力合作，外與國際聯合會協同進行，故有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之發起。<sup>85</sup>

陳立夫認為：「電影要推動教育，而辦教育的人，怎樣使電影進步，來復興我們的民族，掃除國內的文盲，亦為一極重要之事云。」<sup>86</sup>畢竟當時中國有廣大的文盲，對於民眾而言影像與圖像遠遠比文字來更淺顯易懂，而電影就成為政府在宣傳政策上的絕佳工具。陳立夫希望：「在中國電影界振起一陣旋風，把那些充滿著淫魔妖艷、肉感，等等宣傳罪惡的片子，掃一掃乾淨不可，要不然我們所需要含有教育意義的片子，是無法提供到觀眾的前面的。」<sup>87</sup>為了根除中國電影界所染上的「流行傳染病」，屏除那些像是「獎勵人類的罪惡」的影片，那麼就必須拍攝「比較有道德意義」的片子，如此才能啟迪民智，教育民眾。<sup>88</sup>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如何利用教育電影肅清中國的文盲」。<sup>89</sup>「教育幼稚民智不開的環境中，更應該用很大的經費來從事這個事業」。在電影如何深入群眾的實踐上，「北方可以利用車子，南方可以利用船去游〔遊〕行，輪流放映於各城各市各縣各鄉村教人民識字，灌輸普通智識與技能，這是最快而又最有效力的開民智的方法」。

90

<sup>85</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一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頁21。

<sup>86</sup> 〈大會主席團主席陳立夫致開幕詞〉（1935年5月5日），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四屆年會》（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5年），頁14。

<sup>87</sup> 陳立夫講述、王平陵筆記，〈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應負的使命〉，《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1期16（1933年1月），頁36。

<sup>88</sup> 陳立夫講述、王平陵筆記，〈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應負的使命〉，頁31。

<sup>89</sup> 方治，〈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的使命〉（1936年5月），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頁6。

<sup>90</sup> 褚民誼，《利用電影促成三民主義之實現及輔助各種事業之進行》，頁8。

此外，電影在教育上也應該負起指導民眾救貧致富之道與起弱圖強之路，「人民平均知識程度太低，電影應灌輸以切要的常識」、「社會道德墮落到極點，提倡個人及集團的道德」、「民族缺乏組織，電影應指示以組織的知識和能力」，如此才能解決中國的「窮、弱、愚、私、亂」等五大問題。<sup>91</sup>「電影雖為娛樂消遣之工具，但除娛樂消遣以外，尚含有教育意義。因此，一切電影片，皆可視為教育電影」。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曾致函各國教育電影協會，提到：「考察各國運華電影片，每多不悉中國國情，間有描寫失實之處，致我國電影檢查機關檢查時予以修剪，禁演，或將映演時不得觀眾歡迎，甚至因劇情損及國民友好情感。」為了避免上述狀況，特別制定關於教育電影取材五大項標準，如此才能明白何種影片受到歡迎，何種受到拒絕，其標準為：「一、發揚民族精神；二、鼓勵生產建設；三、灌輸科學知識；四、發揚革命精神；五、建立國民道德。」<sup>92</sup>

陳立夫提出：「我們不能僅僅是為著要娛樂，要消遣，才來提倡電影。我們娛樂消遣以外，必須另有一種遠大的計劃，利用電影來做我們的工具，把計劃完全實現出來。這才不失掉電影與教育的意義。」他期望電影協會能在龐雜的電影界形成一個嚴密的組織，「以期方針步驟得以一致，一方面更指導影片的作風，在新路線上踴躍前進」。<sup>93</sup>雖說國民黨在電影事業上著力甚深，也有自己的攝影機構，「仍感製片進程之迂緩，未能增進電影教育之功能，乃由教育電影協會，每年評選各國製片廠之優良影片，擇其富於教育意義者，予以獎勵」。<sup>94</sup>

在電影教育議題上，負責主持電影的幾位國民黨領導人，如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郭有守、張冲、潘公展等，對此著力甚深。除了積極進行電影檢查外，利

<sup>91</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電影事業之出路》（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頁 1-2。

<sup>92</sup> 郭有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史〉，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 年》，頁 8-9。

<sup>93</sup> 陳立夫，〈中國事業的新路線〉，收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 年》，頁 2、17。

<sup>94</sup> 「陳果夫呈蔣中正檢討電影事業創辦十餘年之工作經過報告」（1950 年 10 月 1 日）〈一般資料—專件（三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87-011。

用電影從事教育，同樣是關注的議題。因為，「電影可以引導人們前進的，電影可以移動人們的理智的，電影可以啟發人們的智識的，電影可以感化人們的性情的，所以每部電影在未公演之前，必要經過剪裁和檢查等手續，這就是使電影漸趨於光明之途，使其有益於觀眾，有助於教育」。<sup>95</sup>

其中陳果夫明白電影教育的重要性，也極力推行電影的發展。在主政江蘇之初，陳果夫便期望利用電影推行政策、教育等理念。故在上任一開始便在教育廳社會科設立電影股，專門聘人研究攝製教育影片，並選購外國影片，來對民眾進行教育宣傳，希望藉此引起民眾對電影的廣泛認識。<sup>96</sup>此外，陳果夫認為：「看教育電影，不可當戲看，應該當書看。好書看不厭，電影看不倦，教育力量更無限！消解我煩悶，增長我智識，補充我不易得到的經驗。」<sup>97</sup>所謂的電影教育是：「凡電影片之能增加人民政治、社會、藝術及技術智識者，皆得稱謂教育電影片。」<sup>98</sup>也就是以電影藝術的本身，「利用一個有趣動人的故事，一方面報告那觀眾以事實，一方面組織觀眾的情感，領導他們對於某某人事應有某種見解，應取某種態度的。」<sup>99</sup>

1935年7月間，國際教育電影協會主辦一場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農村電影國際競賽。<sup>100</sup>對此，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認為：「此項國際競賽之參加，一面可顯

<sup>95</sup> 胡賡塘，〈電影教育〉，《格致公學念孫院季刊》，第1期（1935年），頁1。

<sup>96</sup> 「陳果夫呈蔣中正檢討電影事業創辦十餘年之工作經過報告」（1950年10月1日），〈一般資料—專件（三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87-011。

<sup>97</sup> 陳果夫，〈教育電影序幕〉（1935年），收入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陳果夫先生生活回憶遺著選輯》（臺北：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79），頁187。

<sup>98</sup> 薩爾地，《電影與中國》（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頁9。

<sup>99</sup> 洪深，《電影界的新生活》（南京：正中書局，1934），頁8。

<sup>100</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三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頁14-15。參與此次電影競賽影片，大會規定三種題目：「（甲）最能引起農村改進之影片，如農村建設，包含農村風景；（乙）能促進農村家庭經營之合理化影片；（丙）促進農村教育進步之影片，特別注意於兒童品性之養成。」每個國家至多只能送兩部影片參賽，且須於5月1日前完成報名手續，並擇優選曲前幾名，給予獎狀與獎章，賽後大會將購滿有意義的影片。〈我國教育電影協會決今年七月參加農村電影國際競

示我國農業政策及農村建設情形，一面亦得觀摩各國農村改進狀況，在我國銳意建設力圖復興農村之過程中，關係至為重大」，政府高層極度重視，飭由中宣會電影科轉知中央電影攝製場辦理，公開徵求影片劇本。<sup>101</sup>這讓甫剛上任中央電影攝影場場長的張冲，接到此任務深知此次參展意義重大，不但干係個人政治前途，更是中國電影能否弘揚於世界舞臺的機緣，因此委託金陵大學理學院與農學院兩院協同影片拍攝。於是有了《農人之春》的出品。<sup>102</sup>

張冲不僅是《農人之春》的出品責任人，更是親自擔任監製督導影片的拍攝，他以重資邀請當時著名電影大師洪深（1894-1955）、著名導演孫瑜與熊佛西教授（1900-1965）、周光等人擔任演員劇團藝術指導，來確保《農人之春》的藝術水平。<sup>103</sup>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派皮作瓊為代表前往布魯塞爾主持參賽事宜。<sup>104</sup>開演前數分鐘，由皮作瓊（1898-?）用法語介紹影片內容，同時聲明：「片中純我國農村實際狀況，毫無宣傳作用，以使全場觀眾得以事先瞭解製片主旨。映畢，頗著各代表及觀眾稱許。」<sup>105</sup>最後在經過各國評審嚴格的篩選評定之下，《農人之春》獲得第三名佳績，消息傳回中國，令國人為之振奮，各大報爭相報導，1935年7月29日，《申報》用〈我國教育影片《農人之春》獲優等獎〉的斗大標題寫道：

國際聯合會國際教育電影協會，應比國農村生活改進委員會之請，乘國際博覽會之便，在此間主辦農村影片國際競賽會，曾函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

賽》，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上海：電影週刊社，1936），頁445。

<sup>101</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三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年），頁15；〈我國教育電影協會決今年七月參加農村電影國際競賽〉，收入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頁445。

<sup>102</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三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頁15。

<sup>103</sup> 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11-12。

<sup>104</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三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頁16。

<sup>105</sup>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三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頁16。

參加，當由中國代表皮作瓊攜帶黃天佐導演之「農人之春」一片，參加競賽。此片內容描寫中國農家日常生活至為美觀，評判委員會特給以優等獎，此種優等獎為數有三，中國影片即獲其一。評判委員會鑒於此片異常精采，並決定在模範車站電影場公開映演、以示優異。<sup>106</sup>

7月31日，《中央日報》報導：

中央電影場前為了參加比利時農村電影競賽會，特製「農人之春」運往競賽，該片描寫中國農村生活，極為優美，已得該會優等獎，公開映演，尤受歡迎，茲該片編導黃天佐、余仲英、副導演徐賢任、布景張寶禹、攝製顏鶴鳴，以及演員威利、蘭英、吟特、李英等，將由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分別給予獎勵。<sup>107</sup>

會後，義大利、法國、瑞士、荷蘭等國，向中國表達彼此能互相交換影片之意願，希望《農人之春》能在各自國家放映。<sup>108</sup>中國電影藉由《農人之春》的獲獎走出了國門，也讓世界各國認識了中國。

電影宣傳教育在國民政府時期，一直都是被高層所重視的。尤其在中日戰爭的艱困大環境裡，要如何團結全體國民，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就是相當重要的課題。1938年軍委會政治部設立了「電影放映隊」，負責在「戰地、在後方擔起宣傳軍民、教育軍民堅強勇毅地為抗戰建國與努力奮鬥的使命。」軍委會政治部開辦電影放映的訓練班，招收各地流亡的高中程度以上的學員，給予政治的、軍事的、技術的訓練。這些學員在受訓完成後，被編為十個機械化的宣傳部隊，分派在前線與大後方巡迴工作，總計在「湘、鄂、贛、浙、皖、粵、桂、黔、川、豫、晉、陝、甘肅、青海、綏遠、西康等省的都市、小鎮、農村、戰場，以及邊區山

<sup>106</sup> 〈我國教育影片『農人之春』獲優等獎〉，《申報》（上海），1935年7月29日，第2張版6。

<sup>107</sup> 〈『農人之春』在比得獎，電影指導委員會將獎勵黃天佐等〉，《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7月31日，第2張版3。

<sup>108</sup> 〈『農人之春』影片〉，《申報》（上海），1936年3月21日，版7。



野、塞北沙漠都曾留下他們的足跡，在軍民的心坎上，更深刻地留下抗戰電影的活動印象。」<sup>109</sup>政府雖退守大後方，但透過電影放映隊，強化了民眾的信心，同時「深入農村、兵營，鼓勵士氣，宣揚主義，打擊漢奸，加強團結，潛移默化，發展新中國文化。凡是抗戰建國所賦予的任務，他都綜合有著完成不可推移的使命。」<sup>110</sup>隨著電影放映隊的深入，讓更多廣大的民眾了解與認識到電影這項藝術，政府也透過電影的宣傳，來傳達政策上的需要，因為「傷兵看了放映隊的抗戰電影，興奮地並即請求回到前線，民眾看了放映隊電影，踴躍地請求充當志願兵，事實上告訴我們，這一機械化宣傳部隊在戰地、在後方所收的宣傳效果，有時出乎意料之外。」在電影教育部分上，則有：

關於軍事教育片“防禦戰車”等電影的放映，在部隊中所收的效果，據一位前方將領對我們說：他的士兵有一萬人觀看了政治部影片以後，在某地戰鬥中遇到了敵人的戰車，心裡盤算著戰車的優點與缺點，不但戰鬥精神十分奮發，機智亦特別發揚，戰鬥結果估計那次戰役應有五千人的傷亡，但事實上僅有五百人的損失。軍事教育影片的放映，對於士兵所收的效果亦是並非意料所及。<sup>111</sup>

雖上述的內容可能略顯誇張，但不可諱言的是，確實能透過電影來宣傳與教育軍民群眾，因為在當時廣大的文盲中，沒有什麼工具比電影能更有效率的執行工作。

## 五、結論

電影是宣傳的重要工具，並受到各國當局所重視，國共兩黨也都企圖在這塊

---

<sup>109</sup> 〈楊郁人關於軍委會政治部電影放映隊三年來的工作情況的報告〉（1941年12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48-149。

<sup>110</sup> 〈鄭用之關於電影放映隊從艱苦奮鬥中爭取勝利的報告〉（1941年12月5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一），頁146-147。

<sup>111</sup> 〈楊郁人關於軍委會政治部電影放映隊三年來的工作情況的報告〉（1941年12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一），頁149。

領域上佔有影響力。國民黨在執政期間，利用電影檢查與電影教育的方式，來爭取意識形態的主導權，打擊異議份子，尤其是共產黨所主導的左翼勢力。

此外，電影檢查與電影教育是研究國民政府時期電影政策的重要內涵。國民政府透過電影檢查的手段，進一步掌握輿論的主導權，加強民眾對三民主義的認識，「利用電影促成三民主義之實現及輔助各種事業之進行」。再者，國民政府希望透過電影來彌補教育的不足之處，畢竟當時中國有龐大的文盲，而電影能透過影像、聲音來清楚傳達訊息，讓群眾們簡單易懂。這對當時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不過國民政府的電影檢查到也扼殺了許多不同意見的聲音，雖說在遏止當時神怪武俠影片上有不可抹滅的功績，但過度強調一元化意識形態上的宣傳，卻也限制電影從業者在影片的創作與革新。但國民政府的社會控制力有限，由中共領導的左翼電影倒也得的一定程度的發展。

張冲進入電影體系，雖有其政治目的，不過他主持期間完善了國民政府電影事業的發展。從張冲發表有關電影的文章中，明確看出他對於電影有其理想與抱負。張冲也藉由他特務出身的背景，強化國民政府在電影宣傳上的話語權，維持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在張冲主持電影期間，健全了中央電影攝製場的規模，更讓中國電影走出國門，耀眼國際。在往後的臺灣電影發展中，國民黨將在大陸時期的電影政策移植臺灣，中央電影攝製場更是為後來臺灣電影發展的主力之一，因此張冲影響可謂深遠。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會議記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
-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
- 《一般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一般資料—專件（三十三）〉
-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三）〉
-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 〈電影片檢查規則〉

### 二、檔案彙編、年譜、政府公報

- 上海市電影檢查會員會，《上海市電影檢查委員會業務報告（民十八-廿二年度）》（上海：上海市電影檢查委員會，1931）。
- 上海電聲週刊社編，《影戲年鑒》（上海：電影週刊社，1936）。
-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鑑：1934年》（南京：正中書局，1934）。
-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一年度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
-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四屆年會》（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5）。
-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
-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總務組編印，《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三月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會務報告》（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6）。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方治，〈中國電影界應負新運的使命〉，《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 1 期 1，1934 年 4 月，頁 21-23。

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編，《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工作總報告》，（南京：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1934）。

陳立夫講述、王平陵筆記，〈中國電影事業的新路線—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應負的使命〉，《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 1 期 16，南京：1933 年 1 月，頁 19-36。

〈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主任羅剛呈中央宣傳委員會為清查神怪禁片及擬定處置辦法呈文〉（1935 年 1 月 17 日），《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 2 期 1，1935 年 2 月，頁 4-6。

〈邵主任委員發表中國電影界應當注意的幾件工作文云〉，《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 1 期 1，1934 年 4 月，頁 19-21。

〈電影談話會開幕〉（1934 年 3 月 23 日），《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 1 期 1，1934 年 4 月，頁 17-18。

〈電影檢查委員會呈：為請會咨財政部轉飭各海關查禁偷運出口電影片〉（1931 年 4 月 7 日），《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 1 期 1，1932 年 8 月，頁 18-19。

〈電影檢查委員會呈：為請通令頒布各省市檢查電影片報告表〉（1931 年 5 月 25 日），《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卷 1 期 1，1932 年 8 月，頁 19-20。

### 三、專著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電影事業之出路》（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

杜雲之，《中國電影史》，冊 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汪朝光，《影藝的政治—民國電影檢查制度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洪深，《電影界的新生活》（南京：正中書局，1934）。

姚榮齡編，《電影與檢查》（臺北：編者發行，1952）。

郭有守，《我國之教育電影運動》（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5）。

李少白主編，《中國電影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陳智，《首部榮獲國際獎的中國電影《農人之春》逸史》（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9）。

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陳果夫先生生活回憶遺著選輯》（臺北：

陳果夫先生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79）。

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卷 1、2（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

楊燕、徐成兵，《民國時期官營電影發展史》（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

褚民誼，《利用電影促成三民主義之實現及輔助各種事業之進行》（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

薩爾地，《電影與中國》（南京：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3）。

#### 四、期刊

泊泊，〈張冲宴請電影界希望外片絕跡於國內〉，《電聲週刊》，卷 3 期 47（1934 年），頁 931。

汪朝光，〈影藝的政治：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研究〉，《歷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頁 62-78。

胡賡塘，〈電影教育〉，《格致公學念孫院季刊》，期 1（1935 年），頁 1。

張冲，〈電影——一種新的力〉，《華聯畫報》，卷 5 期 2（1935 年），頁 2。

張冲，《蘇聯電影事業》，《中國與蘇俄》，卷 2 期 1（1935 年），頁 1-7。

張冲，〈國產電影的重要性與責任〉，《西北電影》，創刊號（太原：1935 年），無頁碼。

張冲，〈電影教育研究：中國電影教育的使命〉，《教與學》，卷 1 期 8（1936 年），頁 57-59。

舒湮，〈中國的電影檢查〉，《影迷週報》，卷 1 期 4（1934 年），頁 68-69。

〈短訊：張冲大宴顧問先生〉，《影畫》，卷 1 期 19（1934 年），頁 434。

〈風雲兒女〉，《時代》，卷 8 期 1（1935 年），頁 28。

〈電影影評：馬路天使〉，《電聲週刊》，卷 6 期 30（1937 年），頁 1287。

#### 五、報紙

《中央日報》，南京，1935 年。

《申報》，上海，1935 年、1936 年。

## Film Censorship and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1934-1936) :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Films Hosted by Zhang Chong

Wei-Jie, Lin

### Abstract

Modern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s the root of the Kuomintang's ideology and the legal basis of its regim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which the Kuomintang led the government by the party and governed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part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country based on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oped to implement the Kuomintang's ideological concept in every citizen's heart through various means and ways, and film became one of the best tools. After all, China was a country with a large number of illiterate, and film could be the best option for the government to clearly express its ideas and value to the public in the form of images, videos and other forms. Therefore, the Kuomintang had known the importance of film just before it was in power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n, to explore the film industry in the period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e must first start from the two directions, film inspection and film education. Zhang Chong serves as a link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industry in the past and future. Because of his previous spy status and his proficiency in Russian, the brothers Chen Guofu and Chen Lifu valued him a lot and helped him enter the film promotion system. They hoped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of film development in other countries back then and the operation of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crack down on films that were not conducive to the Kuomintang rule, and occupy ideological positions with the help of Zhang Chong.

Keyword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country, Film Censorship, Film Education, Zhang Chong, "Farmers' Spring"